

跨文化的中医

——对法国社会的一次人类学研究尝试

□ [法] 贺 霆

中西文化交流中,当前的中医西传可算是个异数。其“怪异”首先当然是它逆全球西化大潮而动,另外它传播的时机及地域亦不合常理:具有临床意义的西传(主要是针灸)发生于它最衰败的清末民初,又在它最畸变的文革中间成为西方世界的明星(针刺麻醉);作为防病治病的手段,它却在医疗条件完善的欧洲、北美获得了比在非洲、南美等地区大得多的成功,尽管中医为西方过度的化学药物治疗提供了另一种选择,但它的成功显然与其在当地健康系统中的实际作用不成比例。因而可以肯定中医西传中的文化动力大于临床需求,倘将其与西医中传作一比较,则中医主要由西方主动“拿来”而非由中国“送出”。

于是除了它的医学意义之外,中医在西方的形态更是一个“跨文化”研究的理想标本,来反映西方社会如何重组中国文化,以及后者在此中西“文化间际”(跨文化的另一种译法)显示出的“间性特征”,即能与当今西方文化发生关联,且引起对方兴趣的部分。^①

另外,目前在西方的中医与在西方的其他中国“产品”有所不同,它不仅仅是一些书本上的描述与观念,也未被凝固在博物馆中,或只是局限于剧场、电影院及某个节日期间。中医是西方社会内部一个现有的职业,方兴未艾,由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器物、行为组成。特别是它的执业者大多是当地社会的“原住民”,服务对象更是如此;这一点与西方社会里一些主要由中国(亚洲)移民操持的行业(如中餐餐饮业)不同,也与一些基本对外封闭的移民社团(如地方音乐爱好者协会)不

^① 王才勇:《中西语境中的文化迷微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4年,第231页。